

# 山田辰雄主講 「1923年蔣介石 的蘇聯訪問」 紀實

嵇國鳳 國史館修纂處研究助理

## 一、前言

山田辰雄教授，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名譽教授，2013年12月3日應邀至國史館演講，講題為「1923年蔣介石的蘇聯訪問」議題，並評介近年來日本學界對民國史研究的概況，和與會者進行心得交流。

山田教授指出，現今的蔣介石研究已經進入新的階段，在完成民主化以後的臺灣，關於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的研究已經進入一個自由化的階段，新的資料陸續公開，像是美國史丹佛大學所保存的《蔣介石日記》、共產國際有關中國的資料，均陸續翻譯出版，對於今日演講題目及民國史研究均助益很大。關於1923年蔣介石訪問蘇聯的相關研究，過去主要依據蔣介石所著，並於1956年出版《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蔣對蘇俄的觀感。但必須納入考慮的是，《蘇俄在



山田辰雄教授（攝影／林正慧）

中國》一書的出版背景，是當時人在臺灣的蔣介石和國民黨正處於反共態度最強烈的時期。因此有必要以 1923 年蔣出訪當時的日記，以及 1956 年出版此書時的兩個時間點之間，蔣介石的反共態度作比較研究。

關於 1923 年蔣介石訪問蘇聯的議題，山田教授是在宇野重昭、蔣永敬、王聿均與楊天石等 4 位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將此一議題歸納為 3 個方面進行討論分析：1、蔣所擬的西北計畫；2、關於蔣「反共」的幾個問題；3、蔣於訪問中所見所聞的蘇聯社會主義。

## 二、西北計畫

山田教授首先簡述了蔣的西北計畫及其在與蘇聯交涉過程中個人之政治領導特質及其所產生的影響。1923 年 9 月 13 日到 10 月 12 日，蔣介石起草「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的意見書給蘇聯，內容包含軍事計畫部分。西北計畫所認定的革命對象，包含當時在華的帝國主義列強及與列強合作並掌控北京政府的軍閥，其計畫明確指出，國民黨目前尚不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內，也就是中國東南地區奠定一個穩固的革命基地，同時希望在靠近蘇聯邊境的中國西北地區找尋適合施行革命計畫，並能與列強進行鬥爭的軍事基地。蔣認為蒙古適合作為國民黨的軍事基地，但此一立場涉及蒙古在地緣、政治上與蘇聯的敏感議題，蘇聯意欲

將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想法，與蔣對於蒙古的民族認同之間明顯有所矛盾。西北計畫是蔣介石訪蘇的重要課題之一，充分體現蔣與國民黨在革命目標上的構想。可是蘇聯對西北計畫的態度十分謹慎、保守，加拉罕（Leo Karakhan）對其評價為「不可能立即實施」，甚至最後並未將其提報到內部的政治會議討論。從西北計畫的交涉中，可發現蔣的政治領導特質及對蘇的期待上，相當重視軍事行動的積極意義。相反的，蘇聯似乎較重視對社會大眾進行動員與政治工作的必要性，並不打算以軍事行動直接介入中國的國內政治。

## 三、蔣介石的蘇聯訪問和「反共」的幾個問題

蔣介石訪蘇之行後不久，1924 年 3 月 14 日，蔣寫給廖仲愷的信中透露出其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不滿情緒，原因有三：1、蘇聯共產黨的目的在於扶植中共，並協助其獲得中國革命的正統地位，因此並不打算與國民黨長期合作；2、蘇聯欲使滿、蒙、回、藏為己控制，特別是西北計畫中蒙古的地位問題及其在地緣、政治上的敏感性，導致蔣與蘇聯間的矛盾與對立；3、蔣對於在蘇聯的中共黨員的言行舉措明顯不滿。從 1956 年《蘇俄在中國》一書中看來，蔣對於蘇聯和中共的猜忌與不滿，其背後隱含的是以反對共產國際、反對蘇聯、反

對中國共產黨的三位一體形態而存在。除上述蔣的反共理由外，根據該書的內容還可以再加上三點：1、共產國際在 1923 年 11 月 28 日通過中國問題決議文，文中對中國國內情勢不正確的認識，如過分強調階級鬥爭；2、蘇聯政治體制的專制性格；3、訪蘇的國民黨代表團內部的對立。

此外，還必須注意蔣介石在 1924 年與 1956 年之間立場上的差異。此可由 1923 年蔣介石的日記來考察其反共立場，以及此一立場在訪蘇行動中所代表的意義。事實上，蔣介石一方面認為蘇聯的專制體制與三民主義有部分不符；另一方面，1923 年蔣訪蘇之行最大的目的，除了是加強革命運動中黨的作用外，蔣個人則特別看重軍隊的主導力量。由此可見，《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蔣對蘇聯體制的批判，是其後來在長期的反共鬥爭中逐漸形成的，無法視為其 1923 年反共立場之全貌。整體而言，1923 年蔣介石絕非無條件的一味反共，與蘇聯領導人的接觸也並非全面的評價不佳，如日記中記載與馬林（Henk Sneevliet）、越飛（Adolf Joffe）夫婦的交往情形等來看，蔣與當時蘇聯、中共和共產國際的對立衝突既不是全面的，也沒有嚴重到斷絕關係的程度。此時蔣的「反共」，與其日後全面敵對的反共態度是有差異的，然這份差異同時也聯繫到蔣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觀察與評價。

## 四、蔣介石眼中的蘇聯社會主義

蔣介石的反共態度及其對蘇聯社會主義的評價，同樣經歷一段轉變期。1923 年蔣介石訪蘇的首要目的，即是學習蘇聯革命的成功經驗，此時蔣日記中記載了他認為值得學習的改革內容。首先，儘管蔣否定階級鬥爭，但他對於蘇聯革命中工人和農民的作用及軍事教育的訓練感到興趣，特別是蘇聯在社會上嚴密的組織運作，更讓蔣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蔣將其認識到蘇聯在社會運作上黨的權力滲透、集中和強化與蘇聯革命的成功原因聯繫起來。其次，蔣對蘇軍的組織型態，特別是政治委員制度及軍事先進武器，皆表現出高度的興趣。最後則是蔣對教育的關注，即黨和國家對於教育的指導與統籌。以上是蔣訪蘇的見聞與印象，而他對蘇聯政體的評價，尤其在軍事與教育方面，大抵上是以正面立場去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的改革模式。雖然蔣並非沒有看到蘇聯社會負面的、停滯的一面，但從他日記看來，與日後的反共情緒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可以說，蔣在蘇聯的所見所聞，是以間接的形式影響著他對蘇聯政體的評價。

## 五、結論

在 1923 年蔣介石蘇聯訪問的議題上，山田教授認為，藉由比較蔣 1923 年的日記與 1956 年《蘇俄在中國》一書中反共立場

的差異，可以理解蔣對蘇聯、共產國際及中共三者間的分歧與對立實是一個逐步擴大的過程，並非自始便存在著嚴重的敵對狀態。一方面，蔣介石訪蘇期間所感受到的六點，成了他後來的反共理由：1、蘇聯對國民黨在中國革命領導權的不信任與挑戰；2、西北計畫中圍繞蒙古的民族主義問題；3、中共黨員在蘇聯的舉止；4、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決議與評價；5、蘇聯政體的專制性；6、國民黨訪蘇代表團成員的內部對立。儘管蔣介石的立場與蘇聯有所矛盾，但蔣以代表「孫逸仙博士代表團」的立場，希望加強國民黨與蘇聯的合作，加上蔣對部分蘇聯領導人及蘇聯的政治、軍事制度表示肯定的評價，此時蔣所欲仿效的正是蘇聯有助於國家控制、強化黨與社會間組織關係的社會主義模式。此外，從1923年蔣日記中對於蘇聯社會的觀察，找不出其後來所表現出的強烈反共跡象，也就是說，蔣並沒有在訪問蘇聯後，立即形成如他在1956年般堅決的反共立場。事實上，蔣面對蘇聯的態度，是與隨之而來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有關。山田教授認為，《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蔣對蘇聯的正面評價之所以沒有被突顯出來，甚至是被刻意隱蔽，有其時代背景下差異性的考量，蔣對蘇聯政治體制的批判，是在其長期反共鬥爭中逐步形成的。可進一步擴充的議題是，蔣介石如何以蘇聯為師？此一議題除了放在蔣介石個人研究的脈絡來討論外，也涉及中蘇關係之研究，可以一同放在民國史

的脈絡下進行比對與分析。

## 六、綜合討論

在綜合討論中，山田教授與現場與會者交換了許多意見。首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黃自進教授認為，藉由山田教授的演講可以知道蔣在訪蘇之行中對蘇聯大抵上是肯定的，尤其是初期蘇聯與國民黨在事務性合作上，彼此間是沒有隔閡的。因此必須將國共戰爭時期蔣介石的反共情緒自1923年訪蘇之行的影響因素中排除。但是該怎麼去理解蔣的蘇聯訪問與後來黃埔軍校成立，以及在國共合作初期的新方向中，蘇聯對蔣的支持、彼此良好的合作態度之間的關係？山田教授回應表示，蔣介石對蘇聯模式的肯定是一種手段上的學習，尤其是軍事方面的效法，蔣對蘇聯的認同絕非是政治意識形態上的接受。對蔣來說，仿效蘇聯、或是日本、英、美各國，都是一種手段性的想法，蔣有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特別是他思想中有著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獨立性格。

國史館助修郭維雄建議山田教授可以對蘇聯和南方革命政府、北京政府兩者之間的互動與態度進行分析，以加拉罕對華宣言為例，蘇聯對北京政府釋出善意之舉，是否影響蔣對蘇聯的觀感？這部分或可考慮納入。其次，除了蔣介石之外，可以參酌同時期赴蘇聯考察的知識分子，如李大釗、江亢虎、丁文江等對蘇聯革命的關注與見聞，進行通

盤性的比較分析。山田教授回應指出，關於蘇聯和北京政府之間的立場關係，主要還是處於蘇聯革命完成後持續的革命外交策略階段，雖然蘇聯和北京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但還是希望幫助南方的革命政府。山田教授也提到另一種觀點，即唐啟華教授研究指出：當時北京政府已經是一個正式政府，擁有獨立性權力的觀點。此一研究觀點下的北京政府與蘇聯之間的外交關係，具有不一樣的意義。

國史館纂修吳淑鳳提問，一般在探究蔣介石訪蘇之議題，往往聚焦於蔣對蘇聯的觀感與想法上，但此時的蘇聯政府又是如何看待這位尚未成為南方革命陣營要角的年輕軍官呢？其次，關於研究概況的問題，日本學者如何評價蔣在中日戰爭期間的外交策略？最後，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上，山田教授對於中日戰爭所關切的課題是什麼？山田教授回應指出，首先，雖然蔣介石訪蘇時還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軍官，但孫中山對其評價頗高，部分注意中國情節的蘇聯人士也注意到這個現象，像越飛與鮑羅廷，但也有部分蘇聯方面的領導人對蔣還不太重視。其次，關於近年來日本學界對於蔣在中日戰爭之研究，家近亮子的書有些新觀點，歷來日本和中國大陸學界對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多採否定的評價，而家近則運用蔣介石日記來證明，在九一八以後蔣在外交策略上，對於爭取外援抗日這部分是具有積極性的作用與意義。最後，在中日戰爭的研究課題

上，山田教授認為這場戰爭不一定是全面性的戰爭，比較安靜與和平的生活也是有的，像日本占領後的上海和北京的生活，或是毛澤東所駐的延安。雖然戰爭畢竟是戰爭，可是若將戰爭時期中國各地的情形一一作比較考察的話，不一定全部都只有戰爭。另外，日本方面的資料，對於滿洲研究也有其重要意義。山田教授認為他對於中日戰爭所關切的，不一定是一個具體的課題，從日本人的觀點來看，他希望海峽兩岸學者能共同合作，探討中日戰爭中日本的政策、或是當時臺灣在中日戰爭的參與情況，以及海峽兩岸對日本的觀點該如何對話？而這樣的對話儘管會有矛盾，但對於解決與理解歷史認識論上是有幫助的。

李鎧光助修發言，透過山田教授的演講讓我們明白蔣介石在訪蘇時期還不是純粹的反共者，那麼蔣何時才成為一位純粹的反共主義者？山田教授回應，蔣介石原來就有反共思想，但他能不能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和反共政策之間，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蔣介石明確表明其反共態度，大抵上是在中山艦事件以後。此外，從1927年初蔣日記可見，蔣對於鄧演達評價的變化，也和蔣的反共傾向有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邵軒磊發言，請問山田教授近年來日本學界對於民國政治史、或中共史研究，有沒有新的研究觀點？山田教授回應表示最近日本的年輕學者開始研究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即

所謂中間勢力、民主黨派的政治路線。但山田教授認為，民國史從國共到軍閥之間的特徵是他們有自己的軍隊與統治地域，而所謂中間勢力、民主黨派、或是國民黨左派都沒有這樣的發展勢力與條件，因此若只以思想進行討論，極容易產生研究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年輕學者也注意到共產黨組織與社會運動間的關係，如果注意共產黨的社會基礎，可知共產黨並沒有統一的領導權，其統治權是很分散的，階級基礎也很分散。近來日本學界從這樣的社會情況來研究中國共產黨也是有的。其他與傳統研究看法有區別的，還包括社會史、文化史、性別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 出版資訊



### 蔣渭水先生全集 (復刻·別冊)

編校：蔣朝根  
2014年4月復刻  
平裝 800元

蔣渭水是孫文主義思想與平等博愛精神在臺灣的傳承者，在本套書中不遺餘力地介紹孫文的理念與事蹟。當時臺灣人尊崇孫文為「弱小民族之救主」，蔣渭水逝世時被稱為「臺灣人之救主」，猶如孫文在中國近代革命史上的地位，今人仍以「臺灣孫中山」尊崇之。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  
(頁 296)